

“英格尔斯”是“工业时代”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吗

谢立中

最近发表的两份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1)》,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2两年连续出版、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都试图对用来描述和分析现代化进程的概念与指标工具进行创新,提出了应该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在前一份报告中也叫做“传统现代化”,在后一份报告中也叫做“第一次现代化”或“经典现代化”)和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在后一份报告中也叫做“第二次现代化”)加以区分并分别加以描述、评估和分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所谓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只适用于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对于信息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则无法加以应用。我认为,如果暂不考虑其技术决定论方面的局限,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区分开来分别加以描述和分析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把所谓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判定为是一个适于用来对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指标体系却也存在着可质疑之处。

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原始文本依据是英格尔斯198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做的一次讲演。除了个别例外(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报告),在大多数文献中,这个判定指标体系大多由11项判定指标组成。它们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报告做了适当修正)、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5%、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4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在70%以上(或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低于30%)、成人识字率在80%以上、在校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比例在10%—15%以上、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000人以下、婴儿死亡率在3%以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报告中没有这项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50%以上。但阅读英格尔斯当年的讲演记录稿,我们可以发现:

1、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11个。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其实还包括“投资占总产值的比例”、“工业收入占总产值的比例”、“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等。现在人们使用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之所以只包括11个指标当是最初的引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英格尔斯的讲演进行归纳后的结果。

2、虽然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11个,但最初的引用者将其归纳为上述11个也并非毫无根据。英格尔斯在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进行对比时确实只明确地提到了11个方面的指标和标准,而没有提到反映工业化水平的那些指标和标准。英格尔斯的有关原话是:

“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典型数字划一条分界线,这条线是任意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界线。一般说,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农业生产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12%—15%;服务业的收入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45%。”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最简单的测量方法是看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百分比……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是非农业劳动力占70%。”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现代化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有文化人口80%,受高等教育者占适龄年龄组比例为10%—

15%。”卫生保健方面，“现代化国家的分界线是医生对服务对象为 1:1000”。“另一个因素是平均预期寿命。它受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很大……发达国家分界线，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平均预期寿命的分界线为 70 岁以上。”人口生态方面，“①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发达国家的分界线为 50%。②人口自然增长率，……发达国家分界线为 1%或以下。”

但必须注意的是：第一，英格尔斯明确地说他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划的这条线是“任意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界线”。第二，英格尔斯把“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两个概念混用，表明他所讲的“现代化”并非仅指我们今天所讲的“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而是不分工业时代和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只和“发达”同义的笼统意义上的“现代化”。他所指出的那些标准也不是用来判断“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实现与否的标准，而实际上只是用来判断（按当时的情况看）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准。由于英格尔斯在做上述讲演时使用的是 1970—1979 年间各国的数据，此时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社会”而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等），因此英格尔斯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工业时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时代意义上的“现代化”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英格尔斯在比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特别注重“服务业”方面的指标而忽略工业方面指标的一个主要原因。下面这些来自于英格尔斯讲演记录稿的段落可以非常确切地印证我们的这种判断：

“一般假定发达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工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发达国家财富大部分来自服务业，来自科学、教育、为其人口提供住房、食物。”（见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编印【1989 年 10 月】：《社会学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 170 页）

“西方有人说，现代社会是服务的社会。我的好朋友丹尼尔·贝尔对现代社会论述很多。（丹尼尔·贝尔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社会叫做“后工业社会”，因此，这里讲的“现代社会”当理解为“后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本文作者注），他同意布莱克教授说现代社会是知识的社会。服务业数字很高，包括许多教授、科学家、实验员、印杂志和编计算机程序的人。服务业是现代社会的关健，而不是工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那些指标和标准并不是像前面所提两份“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是一些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标准。当我们像英格尔斯以及国内最初引用这些指标的人那样，不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加以区分，只在发达与否的意义上笼统地来使用“现代化”这个词时，将英格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及标准当作是用来判断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尚不会引起大的问题。而当我们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明确地加以区分，却将英格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及标准看作是用来判定“工业时代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时，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